Globethics Repository



宗教研究的「比較」意識與「對話」精神 [Comparative and Dialogic Dimension of Religious Studies (Abstract)]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YANG, Huilin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13 18:05:20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5166

宗教研究的「比較」意識與「對話」精神[1]

楊慧林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

美國舊金山大學（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與北京大學聯合舉辦的青年學者研討會，題為「基督教在中國：比較研究的視角與方法」。[2]在我的記憶中，這可能是比較文學方法與宗教學研究第一次明確地關聯在一起，也是比較文學、宗教學和歷史學的學者們第一次被同樣的題目聚合在同一張圓桌。對於這一「視角」與「方法」下的具體論域，與會的青年才俊都有各自的心得和研究。我希望與大家分享的，則是從密集的討論中延伸而來的話題，即：為甚麼比較文學與宗教學注定會有這樣一場對話？

二〇〇〇年，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恰恰是針對她本人所從事的比較文學研究，提出了「一個學科的死亡」。二〇〇三年她將相關講稿整理成書並以此為題公開出版，在學界引起了強烈的震動。[3]作為一位比較文學教授，斯皮瓦克所宣稱的「死亡」當然不是要取消這個學科，卻是希望真正在「國際」、而非「西方」或者任何一種「中

1.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當代神學與人文學的交叉概念及學術對話」（2006 ZDXM 730002）。
2. 研討會於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在北京大學舉行。
3. Gayatri C. Spivak，《一門學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心」的意義上，喚醒「比較」所蘊含的對話精神，並重建「世界文學」的觀念。大而言之，這其實不僅是對研究方法的檢點，也關涉人文學術得以成立的前提。

「世界文學」所謂的「國際」（international），是與national（民族、國族）相對而言：延及信仰，便是inter-faith（跨信仰）；延及文化，便是inter-culture（跨文化）；延及學科，便是inter-disciplinary（跨學科）；延及主體，便是inter-subjectivity（互主體）。在這種從單一邏輯轉向「中一間」（in-between）概念的趨勢下，則非但比較文學，也包括任何「真正的思想」，都必然帶有某種「解中心」的意味；[4]而一旦超越「中心」之慣性和「學科」之界限，便可能打開新的思想空間。

與比較文學分享上述命意的最典型學科，確實是宗教學。這有西方宗教學的創始者米勒（Max Müller）的名言為證：「只知其一，便一無所知」（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其中潛在的「比較」意識與「對話」精神，實際上已成為比較文學與宗教學共同的立身依據。因此在當代西方學界，宗教學（甚至基督教神學）與比較文學在不同層次上的相互溝通和借鑒，逐漸形成了一道獨特的景觀。

比如美國芝加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特雷西（David Tracy）對語言的神話與歷史的神話之解構，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伊麗莎白·舒士拿－費奧倫查（Eliz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的女性主義神學與文本解讀，英國諾丁漢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米爾班克（John Milbank）的「激進正統論」（Radical Orthodoxy）與文化研究，美國錫拉丘茲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卡

4. Slavoj Žižek，〈霍爾沃德對巴迪烏事件的重現〉（Hallward's Fidelity to the Badiou Event），載Peter Hallward，《巴迪烏：一個真理的順服者》（*Badiou: A Subject to Tru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03），頁ix-x。

普托（John Caputo）關於解構主義思想的神學解說，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斯塔克豪斯（Max Stackhouse）的「公共神學」（Public Theology），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福特（David Ford）的「文本辨讀」（Scripture Reasoning），美國哈佛大學弗朗西斯·舒士拿－費奧倫查（Francis Schüssler Fiorenza）的批判理論研究，英國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賈斯珀（David Jasper）的「神學與文學」研究，德國圖賓根大學（University of Tübingen）漢斯·昆（Hans Küng）的跨文化對話，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Strasbourg）南希（Jean-Luc Nancy）的宗教－藝術理論等等。其中最根本的趨向，正是「跨信仰」、「跨文化」、「跨學科」、「互主體」的內在意蘊。

從西方宗教本身的情況看，這一點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Vatican II）上已經得到特別的肯定，已故的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則在一九九九年發表《致藝術家的信》（*Letter of His Holiness Pope John Paul II to Artists*），其中寫道：「真正的藝術甚至可以超越具體的宗教表達，與信仰的世界極為相似。因此即使文化與教會處於完全不同的情境，藝術同宗教經驗之間也保持着一座橋樑。藝術在日常生活中尋求美和想象的果實，實質上正是對神秘的籲求。即使藝術家探索靈魂中最黑暗的部分或者惡的躁動，他們也是在呼喚一種普遍的救贖願望。」[5]

與之相應，近些年教會內的學者對於文學研究與藝術批評的高度認可也是前所未有的。他們已經不只是寬容或者接納文學研究對基督教內容的涉及，而是從根本上意識

5. 《致藝術家的信》（*Letter of His Holiness Pope John Paul II to Artists*; April 4, 1999），請參：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john_paul_ii/letters/documents/hf_jp-ii_let_23041999_artists_en.html。

到文學研究與神學自身的相似性。比如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的「文學與神學研究中心」，陸續出版了十一卷《文學與神學研究叢書》（*Series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Theology*）；[6]美國聖托馬斯大學（University of St. Thomas）的「天主教研究跨學科委員會」（Catholic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Committee）甚至明確提出：「對於文學藝術的學術分析帶有跨學科的性質，這為不同主題的綜合提供了一種模式，而且恰好也是天主教研究的特徵。」[7]

在宗教學的意義上，比較研究的起點就是對「他者」的進一步關注和界說，就是以「中－間」（in-between）取代單向的主體，就是「將獨一的反思性道德主體置換為一個道德話語中的主體群」。[8]由此成全的不僅是「讓上帝成為上帝」，[9]或者作為信仰對象的「全然他者」，實際上也是當代神學家所表達的一個人文學命題：「讓他者成為他者」，而不是「我們想象的投射」。[10]其中所啓發的，正是單一「主體」之外的「他者」的出場。

由此開始的研究，最終不可能只是通常意義上的文學比較、文化比較、宗教比較，而必然要指向「話語」本身的重構。如果當代人文學術確實包含着對於權力話語以及既定真理系統的挑戰，包含着傳統的「確定性」遭到動搖

6. David Jasper編，《文學與神學研究叢書》（*Series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London: The Macmmillan Press, 1993）。
7. Michael Miller，〈前言〉（Forward），載Sister Paula J. Miller & Richard Fossey編，《天主教文化繪景》（*Mapping the Catholic Cultural Landscap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頁xi-xii。
8. Francis S. Fiorenza，〈導言：對實踐性公共神學的批判性接受〉（Introduction: A Critical Reception for a Practical Public Theology），載Don S. Browning & Francis S. Fiorenza編，《哈貝馬斯、現代性與公共神學》（*Habermas, Modernity, and Public Theology*; New York: Crossroad, 1992），頁 2。
9. Karl Barth，《教會教義學（附導言節選本）》（*Church Dogmatics, a Selection with Introduction*; New York: T. & T. Clark, 1961），頁 51。
10. David Tracy，《對話他者：宗教間對話》（*Dialogue with the Other: the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3），頁 49。

之後對於確定意義的追尋，那麼這也就是比較文學與宗教學所能提供的最重要啓發。

其實，當代神學和宗教研究本身，就是傳統神學之危機的一種產物和解決方式，是對某種獨一敘述的挑戰。按照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的說法：不同的宗教現象具有「最根本的一致性」，而這是「人們直到近代才意識到」的「人文科學精神歷史的統一性」。[11]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當代神學家往往是通過文學藝術去發掘信仰本身所同樣需要的「破執」。

比如賈斯珀一方面强調「研究偉大的文學作品最終會將我們引向無可逃避的宗教的結局」，另一方面也意識到「為了神學而閱讀文學的重要性」。乃至他用來警示當代信仰的，竟是詩人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的一段論說：「愛基督教甚於愛真理的人，接下來便會愛自己的團體或教會甚於愛基督教，最終則是愛自己甚於愛一切。」[12]

另一位英國詩人斯馬特（Christopher Smart）本來並未引起文學研究的太多關注，他寫作長詩《羔羊頌》（*Jubilate Agno*）的時候實際上已被關進瘋人院。而在一九九九年，神學家米爾班克等人《激進的正統》（*Radical Orthodoxy: A New Theology*）一書卻將斯馬特的詩行引為題注，甚至特別提到：「希望本書沒有背離……斯馬特的精神。」[13]恰如《羔羊頌》所預言的：「H是一種精神，所以H就是上帝，……M是音樂，所以M就是上帝，……T是真理，所以T就是上

11. 埃里亞德（即伊利亞德）著，吳靜宜等譯，《世界宗教理念史》（台北：商周出版社，2001），第一卷，頁30、32。
12. David Jasper，《文學與宗教研究：導言》（*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89），頁2。
13. 〈致謝〉（Acknowledgement），載John Milbank, Catherine Pickstock & Graham Ward編，《激進的正統：一種新神學》（*Radical Orthodoxy: A New Theolog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帝，……X有三的力量，所以X就是上帝」；《激進的正統》所要建構的「新神學」（A New Theology），顯然已非傳統意義上的神學。

曾經留下《拉奧孔》（*Laocoon*）和《漢堡劇評》（*Hamburg dramaturgy*）的萊辛（G. E. Lessing），在劇作《智者納坦》（*Nathan the Wise*）中還講述過一個「三指環」的著名故事，堪稱「破執」之經典：

一位父親藏有一枚神奇的指環，據說誰佩戴這指環，誰就會得到上帝和所有人的愛。但是指環只有一枚，他卻有三個兒子。於是父親在臨終前打造了兩枚一模一樣的指環，以便能給每個兒子都留下一枚指環，而連他自己也分不清哪一枚是真，哪一枚是假。後來三個兒子都認為自己才擁有唯一的真指環，爭執不下，只好去打官司。

斷案的法官確實非同一般，他認為分辨指環之真假的關鍵，不在於它的質地、材料和工藝，而在於究竟誰能「得到上帝和所有人的愛」。換句話說，如果三個兒子都不能「得到上帝和所有人的愛」，他們的指環也就都不是真的；如果相反，那麼三枚指環又都可能是真的。在這裏，「真」或者「假」已經不是指環的問題，而是指環所預期的「人」的品質。這品質的根本不是佔有，卻是施予，因為要「得到所有人的愛」，只能首先學會愛，否則又何來「所有人的愛」？這大概也就是中世紀的聖方濟各（Francis of Assisi）在他的祈禱文中所說：「去寬慰才能得到寬慰，去理解才能得到理解，去愛才能得到愛；因為是在給予中獲取，是在諒解中被諒解，是在死亡中得到永生。」

最後「三指環」故事中的法官對那三個小夥子說：「真正的指環無法得到證明，猶如我們現在真正的信仰無法得到證明。而每個人都應該確信他的指環是真的，每個人都

應該去表現那指環所蘊含的愛的力量。」

在萊辛辭世五十多年以後，又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寫下〈論萊辛〉（Lessing）*的長文。其中不僅轉述了「三指環」的故事，還以萊辛與之相關的一段名言作結：「人的價值並非來自一個人所掌握或者妄自認為所掌握的真理，而是他為探索真理所付出的真誠努力。……佔有只會使人靜止、怠惰、驕傲。假若上帝的右手握着所有真理，左手握有唯一的、不斷躁動的追求真理的衝動，……我會恭順地撲向他的左手。」[14]

通過上述神學家對文學的引述和闡發，我們或許會想到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一段特別值得玩味的話：「當詩人作為詩人的時候，他們是先知性的（prophetic），但他們不是……『先知』（prophets），……詩人的夢想是神性的（divine），但他並不夢想一個神（a god）。」[15]當比較文學與宗教學在中國學人的研究中開始相互激發的時候，當二者的結合使一切自我封閉、自我詮釋和「事先的信靠」（Pre-assurance）[16]得以消解的時候，其中所包含的靈感和啓示，或已成為人文學術之價值命意的根本標誌。

關鍵詞：比較　對話　單一敍述　中－間

作者電郵地址：huilin@public.bta.net.cn

* 此文載巴特的《十九世紀的新教神學》（*Die protestantische Theologie in 19. Jahnhundert*）。——編注

14. 萊辛著，朱雁冰譯，《歷史與啓示》（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頁 79-80、333。
15. Jacques Derrida，《宗教行動》（*Acts of Religion*; ed. Gil Anidjar; New York: Routledge, 2002），頁 54。
16. 同上，頁 44。

Comparative and Dialogic Dimension in Religious Studies

YANG Huilin
Ph.D.,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studies seem to belong to different disciplines, but they are engaged more and more in dialogue. When contemporary Chinese religious scholars propose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ie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they are perhaps unaware that the foundation of religious studies lies precisely in an awareness of the "comparative" and in the spirit of "dialogue". The reverse from single narrative to "in-between" logic can be regarded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nspiration tha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studies can contribute to humanities.

Keywords: Comparative; Dialogic; Single Narrative; In-Between